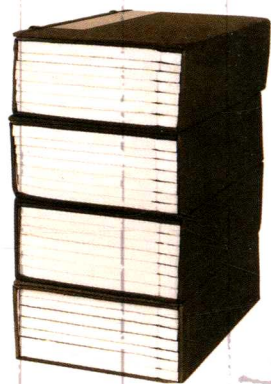


民国时期的 古籍丛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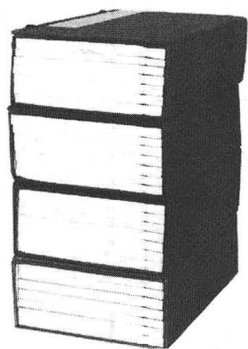
崔建利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民国时期的 古籍丛书研究

崔建利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时期的古籍丛书研究/崔建利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 - 7 - 5161 - 8479 - 0

I. ①民… II. ①崔… III. ①古籍—丛书—研究—
中国—民国 IV. ①Z121.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614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志兵
特约编辑 张翠萍等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25
插 页 2
字 数 305 千字
定 价 6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号 12YJA870002）

聊城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目 录

绪言	(1)
一 古籍丛书概念及发展简史概略	(1)
二 民国古籍丛书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5)

上 篇

第一章 民国时期古籍丛书编纂出版的历史背景	(13)
第一节 民国年间新版古籍丛书的政治经济因素分析	(13)
一 社会政治因素	(13)
二 经济因素	(16)
第二节 思想文化与教育因素	(18)
一 以科学、民主、创新为旨归的反传统思潮	(18)
二 整理国故运动	(21)
三 教育	(23)
第三节 物质技术基础和社会需求	(25)
一 国外先进印刷技术的引进	(25)
二 封建式藏书楼的衰落和开放式图书馆的兴起	(26)
第二章 民国时期古籍丛书的编纂出版状况	(31)
第一节 民国时期古籍丛书编纂出版的时段特征及其统计	(32)
一 民国时期古籍丛书统计来源及其数量	(32)
二 民国时期古籍丛书的时段特征	(34)
第二节 民国时期古籍丛书的主要出版方式	(38)
一 雕版古籍丛书	(38)

二 影印本古籍丛书	(41)
三 排印本古籍丛书	(44)
第三章 传统古籍丛书的编纂及刊刻主体	(47)
第一节 私人	(48)
一 形形色色的民国藏书家	(49)
二 民国私刻古籍丛书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50)
第二节 书肆	(51)
一 民国年间传统书肆的发展状况:数量不减, 运营模式渐变	(52)
二 民国年间书肆的运营模式	(53)
三 重要书肆及其丛书刊刻	(54)
第三节 部分公立机构	(58)
一 公立图书馆	(58)
二 地方政府临时成立的编委会	(62)
三 各类社会团体	(64)
第四章 商务印书馆的古籍丛书出版	(66)
第一节 商务印书馆的古籍丛书编纂出版概况	(66)
一 新中国成立前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历程	(66)
二 商务印书馆的古籍丛书出版概况	(69)
第二节 张元济主持出版的古籍丛书	(72)
一 张元济生平述要	(72)
二 张元济的古籍丛书出版理念	(74)
三 《四部丛刊》初编、续编、三编	(76)
四 《百衲本二十四史》	(86)
五 《续古逸丛书》及其他重要古籍丛书概览	(93)
第三节 王云五主持编纂出版的古籍丛书	(98)
一 王云五生平	(98)
二 王云五的古籍丛书出版理念	(105)
三 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主持出版的古籍丛书概观	(107)

附记 20 世纪中叶以后海峡两岸对《丛书集成初编》的续编与续纂	(114)
---------------------------------------	-------

第五章 中华书局及其他重要出版企业编纂出版的

古籍丛书	(121)
第一节 民国时期中华书局及其出版理念	(121)
一 陆费逵与中华书局	(121)
二 中华书局民国年间的出版理念暨出版特色	(125)
第二节 中华书局的古籍丛书编纂出版概况	(127)
一 中华书局古籍丛书出版概述	(127)
二 部分古籍丛书简介	(129)
第三节 《四部备要》	(134)
一 商业竞争与《四部备要》编纂缘起	(134)
二 《四部备要》的编纂出版过程	(135)
三 《四部备要》的特色及其社会评价	(141)
第四节 其他重要出版企业的古籍丛书出版	(144)
一 文明书局	(144)
二 世界书局	(148)
三 开明书店的古籍丛书出版	(153)

第六章 民国时期重要古籍丛书编纂出版家(上): 罗振玉

第一节 罗振玉生平	(157)
一 罗振玉生平简略	(157)
二 收藏与学术	(159)
第二节 罗振玉的古籍丛书编纂与出版	(161)
一 罗振玉: 民国时期编纂出版古籍丛书数量最多的学者	(161)
二 罗振玉汇编古籍丛书简介	(163)
三 罗振玉类编古籍丛书简介	(174)

第七章 民国时期重要古籍丛书编纂出版家(下)

第一节 叶德辉 徐乃昌	(178)
一 叶德辉	(178)

二 徐乃昌	(183)
第二节 陶湘 董康	(189)
一 陶湘	(189)
二 董康	(196)
第三节 刘承干 张钧衡	(200)
一 刘承干	(200)
二 张钧衡	(206)

下 篇

第八章 汇编古籍丛书	(211)
第一节 杂纂类古籍丛书	(211)
一 杂纂类古籍丛书概观	(211)
二 重要杂纂类古籍丛书举隅	(212)
第二节 郡邑类与氏族类古籍丛书	(218)
一 郡邑类与氏族类古籍丛书概观	(218)
二 重要郡邑类古籍丛书举隅	(220)
三 重要氏族类古籍丛书举隅	(229)
第三节 独撰类古籍丛书	(231)
一 独撰类古籍丛书概览	(231)
二 重要独撰类古籍丛书举隅	(232)
第九章 类编古籍丛书	(237)
第一节 经部及史部古籍丛书	(237)
一 经、史部古籍丛书概览	(237)
二 重要经、史部古籍丛书举隅	(239)
第二节 子部古籍丛书	(247)
一 子部古籍丛书概览	(247)
二 重要子部古籍丛书举隅	(249)
第三节 集部古籍丛书	(254)
一 集部古籍丛书概览	(254)
二 重要集部古籍丛书举隅	(257)

余论 民国古籍丛书出版业的现代启示	(264)
一 健全的法制是维护古籍丛书出版企业权益的重要前提 ...	(264)
二 科学的顶层规划是避免新出古籍丛书重复收录 重复出版的重要保障	(266)
三 影印是传承和保存古籍的最佳方式	(268)
四 质量是排印整理本古籍丛书的生命线	(270)
参考文献	(272)
后记	(282)

绪 言

一 古籍丛书概念及发展简史概略

古籍丛书的概念实际上由古籍和丛书两个概念决定,因此,要确定古籍丛书的概念,首先要对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加以界定。学界关于古籍的界定主要体现在对其时限的把握上,主要有两种:一是1911年之前(含1911年)说。上海图书馆编《图书馆工作手册》就认为:“中国古代书籍,通常称古籍,主要是指书写或印刷于1911年以前、反映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古典装订形式的书籍。”^①也有的说成是“1912年之前”,或“清代以前”等,虽表述有异,实际上是一回事,即认为古籍的时间后限为1911年。这种观点较普遍,目前已基本为学界所接受。现在全国古籍普查和《中华古籍总目》的编纂将时间定为1912年以前的汉文古籍。二是将古籍的时间后限界定为五四运动或1919年。这种观点以吴枫为代表,他认为:“古籍,亦称古典文献,一般是指五四运动以前雕版、活字版或手抄的古籍文献,同时包括文书、卷册、碑铭、拓本等。”^②本课题研究所涉及的“古籍”概念,以第一种观点为据。

丛书是我国古籍编纂和存在的主要形式和方式,有关丛书演变历程及其内涵,历代学者多有述及,清末民初缪荃孙在其《校刻〈儒学警悟七集〉序》中曰:“唐以来有类书,宋以来有丛书,朱氏《紺珠》、曾氏《类说》,已汇数十种而刻之,然皆删节不全,至取各书之全者,并序跋

① 上海图书馆编:《图书馆工作手册》第十三章《古籍整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年版,第652页。

② 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55页。

不遗，前人以左圭《百川学海》为丛书之祖，顾《学海》刻于咸淳癸酉，先七十余年已有《儒学警悟》一书，俞鼎孙、俞经编，计七集四十卷。”缪氏为近代中国版本目录及刻书大家，近代许多重要古籍丛书的刊刻都由他亲自董理。缪氏这段话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给世人传达出某种结论，而在于其彰示出一直到民国初年，关于丛书起源及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仍旧众说纷纭。其实，直到目前，学界关于丛书的定义仍旧存在不同争论。1990年出版的《图书情报辞典》对丛书是这样定义的：

汇集多种单独著作而成的一套具有一个总书名、并以编号或无编号形式出版的图书。其中每一种书都有其自身的书名，都是一部完整独立的著作，可以由一人所著，也可以是多个著者的著作汇编。

这一定义基本上体现了学界主流观点。就目前来看，有关丛书的几个内涵，在以下方面基本无疑异：就内容而言，丛书一般围绕一个中心题目，但所收诸书彼此并不一定有内在联系；就形式而言，版式、书型、装帧等大多是相同的；就收集单独著作的数量而言，少则三五种，多达数千种，如《四库全书》共收图书3470种；就出版方式而言，或一次出齐，或逐册出版多年乃毕，不一而足，等等。但对于著者相同的多部书合刊是否应算作丛书，学界分歧还是较大的。曾贻芬、崔文印就认为：

所谓丛书，是指把不同作者的若干著作，按着一定的规程，完整而不是节略地把它们收录在一个总的书名之下，这个囊括诸书的新书，就是我们所说的丛书。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加以强调：（1）丛书所收之书，必须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作者的著述；（2）丛书所收的任何著述，都应完整而不是节略的。强调前者，是为了把丛书与个人选集、全集区分开来；而强调后者，则是为了把丛书与类书及其他资料汇编区分开来。^①

这一观点也不无道理。但这样一来，同一著者不同著作的汇刊便被排斥在丛书之外，而这类汇刊在民国时期古籍出版中并不少见。为了尽可能

^① 曾贻芬、崔文印：《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75页。

全面地兼顾民国古籍丛书编纂出版的各方面，本课题研究舍弃此观点，而是遵从《中国丛书综录》为代表的主流观点对丛书内涵的界定和外延的取舍。

丛书在中国古籍的保存、传播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清代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说：“丛书最便学者，为其在一部之中可赅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据杨家骆统计，中国历代著述之确曾成书并经著录者至少有 25.3 万余种，而今存世者仅约 10 万种，其中收入丛书中者约有 8.5 万种，靠单行散刻流传者仅约 1.5 万种，在收入丛书的 8.5 万种古籍中约有 1.5 万种存在单行本。故现存 10 余万种中国古代典籍中，因辑入丛书而免遭佚失并流传至今者多达 7 万余种。由此可见，古籍丛书对于保存中国古代典籍的重要性。

中国的丛书具有悠久的历史，可以溯源到先秦两汉，至宋代而形成，至明清而大盛。有关丛书的发展历程及其学术地位，谢国桢曾在《丛书刊刻源流考》中作过简明概述：

自唐有类书、宋有丛书，而后古今著述始流传于世，供诸读者，盖零圭片羽，搜求甚难，而编辑众长，汇为一编，故传播自易也。沿及明、清两代，丛书之业，刊刻日繁，搜罗至广，学者欲求以往著述，属于何类之书，均可于丛书中求之，遂成学术之宝库矣。^①

一般认为中国的丛书始于南宋俞鼎孙、俞经二人编的《儒学警悟》。李春光先生在《古籍丛书述论》中认为东汉末年的《熹平石经》应为中国丛书之始，这一观点是很有道理的。按今天学界关于丛书内涵的界定，《熹平石经》和《儒学警悟》都属于类编丛书，不同之处在于，《儒学警悟》之名是辑书时即有的，而《熹平石经》是后代命名的，至于木刻与石刻，只是刊刻方式或载体不同而已。遗憾的是，《熹平石经》在中国丛书史上的这一地位尚未引起学界充分重视。

《儒学警悟》编辑于嘉泰二年（1202），收入宋代《石林燕语》《演繁露》《嫩真子录》《考古编》《扈虱新话》《萤雪丛说》共六部著作。这部书流传很少，直到 1922 年才由陶湘刊行。因此，人们一般也将流传有

^① 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丛书刊刻源流考》，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48 页。

序的、南宋时期宋左圭所辑的《百川学海》作为丛书的鼻祖。《百川学海》收书 100 种，多为唐、宋时期的野史杂说，当时即经雕版印行，流传较广。元代也有丛书，但数量不多，较有名的是陶宗仪辑的《说郛》。不过，此书虽取“丛书”的形式，实际则是以“说”为标准的选本，因此，它在性质上还不能算作完全的丛书。明代在经历了元末的社会动乱之后出现了新的统一局面，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印刷业更加发达。尤其是明中叶以后印刷技术不断改进和革新，应用了铜活字和木活字，印书能力明显提高，为丛书的快速批量印刷创造了有利条件，使丛书的数量和品种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从形式上看，明代的丛书，既有只收两种的《庄骚合刻》，又有收书十几种、几十种乃至百种以上的丛书。从内容上看，既有综合性的，又有专科性的，诸如族姓（氏族）丛书、自著丛书、地方丛书等。嘉靖年间陆楫等编辑的《古今说海》收书 135 种，分说选、说渊、说略、说纂四部，多为唐、宋文人的小说，是中国最早的小说专门丛书。在综合性丛书中，又可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通代的，另一种则是断代的。《百陵学山》《夷门广牍》等当属前者，《汉魏丛书》《唐宋丛书》等属后者。

清代丛书的编刊在明代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其表现首先是注意编纂质量。有的非常注意选择善本，有的在校雠上下了很大功夫，有的则热心于刊刻罕见之书，以学术价值为决定取舍的重要依据之一。其次是丛书刊刻地域更广，数量更多。在现存丛书中，有很大部分系清代所编纂，较著名的丛书有曹溶编辑的《学海类编》、汪士汉校刊的《秘书二十一种》、卢文昭校刊的《抱经堂丛书》、鲍廷博校刊的《知不足斋丛书》等。在清代编辑的丛书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乾隆年间所编辑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标志着我国古代丛书编纂水平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也标志着清代成为中国古籍丛书编纂的鼎盛时期。清人编纂的丛书不但在数量上超出了宋、元、明三代的总和，而且在质量上也远远超越了其前各代。清代考据学和校勘学的兴盛，为编辑古籍丛书提供了质量上的保证。而国人有志于保存古代文化，又给编纂古籍丛书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许多学者几乎用毕生的精力整理古代文献，进行注释考证，辨别真伪，校勘讹误，既保证了丛书出版的质量，也为丛书的出版提供了丰厚而又高质量的学术资源。

二 民国古籍丛书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民国时期是指 1912—1949 年间 38 年的历史时期。当时的中国虽然战乱频仍，内忧外患不断，但思想很活跃，中国出现了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次百家争鸣的盛况。学术相对繁荣，加上印刷技术的进步和逐渐推广，现代图书馆运动的扩大和深入人心及各级各类图书馆纷纷建立等，为大型古籍丛书的编纂和出版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基础、坚实的技术保障及广阔的市场需求，相继出现了《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初编》等大型综合性丛书。这些丛书不仅从收书容量上进一步增加，分类及印刷方式上也更加多样和灵活，既有传统的雕版印刷，又有石印、影印、铅字排印等近现代印刷方式的运用；既有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也采用十进制等现代分类法。这些都标志着传统古籍丛书的编纂和印刷随着现代印刷技术的出现和成熟而进入一个新阶段，也使古籍丛书保存和传播古典文献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加强。据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中国近现代丛书目录》及阳海清编《中国丛书广录》、施廷镛编《中国丛书综录续编》等丛书目录统计，民国年间出版的古籍丛书超过 1000 种，对这份丰厚的学术文化遗产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也具有很好的实际应用价值。

传统古典文献学中的“丛书”概念，主要是指古籍丛书。所以，古籍丛书的研究在中国已有很长的历史。但就民国时期的古籍丛书而言，到目前为止，国内专门的研究著述并不是很多，国外相关著述更是罕见。就国内而言，涉及民国时期古籍丛书的著述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民国时期。民国时期虽然是古籍丛书编纂出版的小高峰，但很少有人从研究的角度对此加以审视，纯粹意义的研究著述很少见。这一时期对于古籍丛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丛书书目的编撰及整理上，可视为民国古籍丛书研究的先声。嘉庆四年（1799）顾修刊《汇刻书目》，这是迄今最早行世的专门丛书目录，后来结一庐主人朱学勤（1823—1875）又对其进行了增订。在此基础上，1911 年金步羸撰《丛书子目索引》，可视为民国以来丛书编目暨研究之发轫之作。1914 年，罗振玉因感于朱学勤修撰《汇刻书目》失载颇多，遂刻其《续汇刻书目》10 卷，朱编未载者尽其能一一补入。同年杨守敬编《丛书举要》多至 60 卷，收书 704 种，且附

刊误记。1918年李之鼎增订为80卷,以四部分类排列,更按时代、地方分类。1928年医学书局印行《丛书书目汇编》附补遗,以笔画为次,附子目。同时,开明书店也刊印《丛书子目索引》。1929年,刘声木补续《汇刻书目》,次年又刊印再续补本,收书780种,1935年编三续本,共收书700种。1930年,浙江图书馆印《丛书子目索引》,1931年,杜苏韶编印《丛书书目续编初集》。1934年,杨树达编《群书检目》,同年孙殿起编印《丛书目录拾遗》。1935年,金陵大学图书馆编印《丛书子目备检·著者之部》。1936年,清华大学图书馆编印《丛书子目书名索引》、杨家骆辞典馆编《丛书大辞典》等,尽管这些丛书书目及工具书的编纂主要针对清以前的古籍丛书,但传统目录学所具有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使得这些书目编纂活动本身体现了编者对传统古籍丛书的梳理和审视。

二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至今,世人对于民国时期古籍丛书的研究呈现出由疏到密、由宽泛到专门等特征。从时间上看,学界有意识地以古籍丛书为研究对象,主要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专著、论文两大部分。

就研究专著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 有关丛书或古籍丛书的研究著述

这类著述主要以中国古籍概况或丛书史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中或多或少涉及民国部分丛书情况的介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了刘尚恒的《古籍丛书概说》一书,可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古籍丛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专著,该书内容大体分两部分,前一部分主要从古籍丛书的概念和起源、古籍丛书的发展、古籍丛书的类别、古籍丛书的价值和利用四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古籍丛书的发展演变历程及特征,后一部分则是对75种综合性古籍丛书进行了罗列式简述。书中除了对清代以前的古籍丛书作系统论述外,还对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古籍丛书状况作了研究叙述。此后,1991年辽沈书社出版了李春光的《古籍丛书述论》一书,该书阐述了中国古籍丛书的性质和种类、起源和发展、作用和价值,并分别论述了宋、元、明、清及民国时期的丛书,内容及结构特点是以时代为经,以各时代重要丛书为纬,对民国时期重要古籍丛书的论述占较大篇幅。吴家驹的《古籍丛书发展史》则除了从介绍古籍丛书的概念源流分类入手,逐朝分析总结该时段古籍丛书发展状况外,更多着眼于古籍丛

书的体例、内容及类别发展的历史,编撰理念、成熟与否等,且关注了台湾地区的古籍丛书出版状况以及新兴的古籍资源数字化建设现状,弥补了已有关于古籍丛书研究的不足,其中关于民国时期古籍丛书情况的介绍也颇翔实。

2. 出版史或古籍史类著述

大陆方面主要有王余光、吴永贵《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吴永贵《中国出版史(近现代卷)》和《民国出版史》,肖东发《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张志强《20世纪中国的出版研究》,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吉少甫主编《中国出版简史》,张煜明编著《中国出版史》(武汉出版社,1994),来新夏等编著《中国图书事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金德建著《古籍丛书》(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蒋复璁等著《中国书籍考论集》,李文琦等著《中国书籍演变论集》,昌彼得著《中国图书史略》等。港台及海外学者有关图书史的研究著作主要有史梅岑著《中国印刷发展史》、台湾印刷学会编《中国印刷简史和现况》、高越天著《中国书纲》,等等。这类著作有的以出版为视角,有的以图书史为主线,对民国时期的古籍丛书的介绍或是几笔带过,或是鸟瞰式概述,或是就最具影响力的三两部丛书进行剖析,虽然这些论述主要是为阐释“中国出版史”或“古籍图书史”服务,却为“古籍丛书”的研究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参考或线索。

3. 出版史资料整理类著述

主要以张静庐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和《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及宋原放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及其补卷等为代表。张静庐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分初编、二编两册,系收集自同治元年(1862)至1918年间有关新兴出版事业的重要资料编纂而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分甲、乙、丙、丁四编,在丙、丁两编间出有《中国出版史料补编》(“补编”和“丁编”主要集录近、现代各编中未及收录的资料),甲、乙、丙三编收集了1919年至1949年间有关出版事业的重要资料,取材范围以与图书、期刊的编译、出版、印刷有关者为主,附刊书影、插图等。张氏二书中有关民国时期古籍丛书资料颇丰,对于研究民国时期古籍丛书的出版状况及时代背景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宋原放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特别是近现代部分,时间跨度长(1919—2005),选录资料翔实,为课题研究必备参考书目。除上述两著外,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编辑

的《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也是近代古籍丛书研究必备参考文献。该书采用《史记》的写法，逐个介绍了中国20世纪对编辑出版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的著名人物共54位，如张元济、王云五、高梦旦、陆费逵、舒新城等，其中有许多既是开创现代出版业的代表人物，也是近代古籍丛书编纂出版大家。该书对每一位代表人物收集和选登的历史资料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传主本人写的与编辑出版工作有关文字或生平自述；第二，传主亲属写的回忆录；第三，友人和研究者写的回忆和评论；第四，与主题有密切关系的史料存目，包括专著和文章。范军编撰的《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1985—2006）》则对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期有关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方面的著述作了辑录和介绍，是一部颇有参考价值的工具书。

4. 部分文献学通论或文史工具书指南类著述

这类著作很多，大多从文献学术语角度或从工具书查阅角度来诠释古籍丛书，多以民国时期编辑出版的三大丛书为例介绍丛书的功能、特点及作用。像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2001）、李国新《中国文献信息资源与检索利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等。

以上几类著述虽都有对民国时期古籍丛书的介绍或研究，有些出版类著述中的相关内容还颇为翔实，但或侧重于“丛书”概念的阐释，或立足于出版史整体，或局限于极个别重要丛书的举例性介绍，都无法形成或替代对于民国时期古籍丛书的专题研究，这正是本选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和努力方向。

专题论文方面，主要有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两种情况。

期刊论文方面，近年来，民国时期的古籍丛书逐渐引起学人的关注，出现了几篇以民国时期的古籍丛书为直接研究对象的论文，如张敏慧的《近代三大古籍丛书的比较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01）、杨曼的《民国时期的古籍丛书出版探要》（《图书馆学刊》2005/02）、贾鸿雁的《民国时期古籍丛书出版的成就与影响》（《图书馆杂志》2003/01）及《民国时期丛书出版特点试析》（《江苏图书馆学报》1995/06）等，这类论文虽侧重于民国时期古籍丛书的某一方面进行论述，但针对性强，局部论述和分析较透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非直接以古籍丛书为切入点的论文更多，有的从古籍出版的角度，像刘洪权的《民国古籍出版对当代古籍出版的文化贡献》（《编辑之友》2007/